

免责声明：凡在本杂志发表的文章只代表作者观点，而非美国国防部、空军部、空军教育和训练司令部、空军大学或美国其他任何政府机构的官方立场。



编读来往

我们欢迎读者品评本刊文章，或提出有关改进刊物质量的任何建议。请用电子邮件将评论直接发给 aspj.chinese@yahoo.com。编辑部可能按版面需要对读者来信及作者答复做适当编辑。

读者评论“占据一席：向空军协调官放权”

豪斯杰中将是德高望重身经多战的空军老战士，其文章“占据一席：向空军协调官放权”（英文版 2010 年冬季刊，中文版 2011 年春季刊）再一次及时提醒我们：领导打仗说到底要靠人，人的亲临和在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引导战争的发展非常重要。我还十分欣赏将军的另一个明智表述，即我们必须集中控制高需求/低密度作战资产，这对充分运用空中力量与生俱来的灵活性和远程能力以及对经济合理使用作战能力而言，都有重大影响。

但我对将军的这篇好文章也有保留，未敢苟同将军所称的“我的意图……是保证地面指挥官取得成功。”我提出疑义，是因为有些读者会将此话误解为我们从头至尾必须以地面为中心，除此战法之外，其他任何作战方式都不可能实现国家在阿富汗的战略目标，甚至不可能在任何冲突中实现战略目标。我觉得，对将军这段话的更好解释应该是：始终把完成全局使命作为重点，不可偏废和偏向，例如不可只是简单地保障某军种指挥官取得成功，无论是地面军种还是其他军种。换句话说，完成作战使命需要联合努力，而非只重视支持某一个军种组成部队。从更广义的角度看“联合”，目前的情况是，真正意义上的联合大概处于我多年所见的最低程度。空军向姐妹军种提供了巨大的支持（鲜有回馈），却吃力不讨好，甚至适得其反。尤其是，我担心我们空军越来越把自己看成是一个附属军种、一个只向地面指挥官提供服务的军种。这对国家而言不是好事。我们不应该忘记，在 2001 年，只用几个星期就击

溃塔利班组织的，是各军种中的空中力量，虽然地面部队的辅助也必不可少。不幸的是，在此之后，各种以地面部队为中心而忽视联合作战的战略大行其道，把早期的成功挥霍殆尽。

看来，现在是在我们的战法中重新加强天空意识（不是以天空为中心）的时候了。请注意：“天空意识”的核心，不只是关乎空军，甚至不只是关乎空中力量，而是指一种更明智的作战方式；它强调的是战略目标，它最基本的做法是寻找机会削弱敌人使用武器进行反抗的能力，从而实现我方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它义无反顾地全盘否定地面军种对那种经常充满血腥且代价高昂的“肉搏战”的嗜好。用老前辈巴顿将军的话来解释，就是不能眼看着另一个同伴为着理想而赴死——如果我们能置自身于安全距离之外而歼敌，何乐而不为。天空意识意味着以俗语所说的“不公平决斗”干掉敌人，言下之意（虽不总是这样），就是运用敌人没有或者还没有掌握的技术来占据优势。这也包括震慑敌人，让他知道自己面对的对手是不知道怜悯、没有意识的机器，这个机器会无情地追击他，赶尽杀绝，绝不手软。天空意识的目的是散布原始恐惧，如果运用得当，其所生成的心理作用不仅使敌人心生恐惧，更使之彻底绝望，最终心理崩溃。这种战法要么摧毁其意志，要么摧毁其肉体，从而无情地迫使敌人二者择一，选择自己的命运。

空军，就要从空军角度看问题，就要把空军不同于其地面姐妹军种的独特视角带入战争。我甚至觉得，地面指挥官和其他军种指挥官需要的，正是这一点。我们有必要记

住国防部次长傅罗尼 (Mich è le Flournoy) 的告诫：“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早期，空军是 [国防部内] 开创新战略思维的先锋，有力推动了战争的作战新观念和新方式。那时候的空军在五角大楼简直就是思想领袖的化身。而后光环褪色，空军渐渐沉寂，虽然今天的形势比以往更迫切呼唤着空军的这种思维创新精神。”（参看“Remarks to the US Air Force Senior Leader Orientation Course” [在美国空军高级领导人辅导班上的讲话]，(speech, Air University, 14 August 2009), <http://www.au.af.mil/au/aunews/archive/2009/0419/Articles/USDPRemarks.htm>) 我认为豪斯杰中将的文章对于帮助空军重新树立明智作战意识而言，是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让我们正确理解这篇文章，万不可误读误解而失其本意。

Charles J. Dunlap Jr., 美国空军退役少校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

读者评论“美国的阿富汗战略和此战略对美国空军的影响”

“美国的阿富汗战略和此战略对美国空军的影响”一文分析美军在阿富汗战略将分为三步，其一，帮助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民主型政府”；其二，在很可能没有彻底消灭基地组织的情况下坚决按计划“撤出地面部队”；其三，对基地组织残余实施“围堵”以“把叛乱分子的威胁围堵在可控范围内”。虽然作者的原意是以这种战略预测为铺垫来论证美国空军如何在未来的长期围堵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以免沦为“危机军种”，我想就围堵战略本身发表看法。

围堵——围而堵之最终克之，我想作者提出围堵战略是想以最小代价来获取最大收益。我国古代常用断绝水源、粮食、与城外的通信等方式来迫使坚城投降。元军忽必烈围克襄阳就用了 6 年；清军皇太极围困锦州（守将是祖大寿）也用了近 2 年；唐朝安史之乱中叛军围困张巡守卫的睢阳，久攻不克。

可见这种战略成本（时间、人力、后勤）较高，而胜算不太高。至于作者所引证的冷战期间西方通过围堵“成功地对付了一个极其强劲的对手”，我想，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可能不是物理“围堵”本身，而是西方在意识形态的对抗中占了上风。

所以我的观点是：若对对手实施围堵战略，在围堵的同时，需从敌人内部进行突破。如情报机构应派人打入敌人内部，或策反敌方高级领导人，或做出一些使敌人互相猜忌、窝里斗的事情。宣传机构应在意识形态领域大力开展宣传战、攻心战、诱诈战，这样几管齐下，效果可能会更好。

李欣
中国河北省

读者评论“确保空军指挥与控制机制适应二十一世纪联合作战需要”

布里德勒夫中将和泰勒少校合写的“确保空军指挥与控制机制适应二十一世纪联合作战需要”（英文版 2010 年秋季刊，中文版 2010 年冬季刊）是篇佳文，其中强调了在我军指挥控制体系中保持良好私人关系和灵活性的必要性。但有一点值得商榷：即作者所称“……在第一个问题 [联合部队各方之间的相互信任] 上，指挥官个人之间的关系往往比指挥体系关系更加重要。”我担心此话容易让人误解为正式的指挥关系本身无足轻重，或者无需花费时间精力去思考如何理顺指挥关系。因此我觉得，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指挥关系和私人关系都重要，两者缺一，都可能削弱我军指挥体系的效能。

Edward J. Groeninger, 空军退役上校
美国佛罗里达州 Hurlburt Field